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的因素

全国总工会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主力。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就业、生活环境改善的同时,对精神、情感生活的需求期望更强烈。

作为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尊严感究竟如何?半月谈社民意调查中心特别策划组织了“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大型调查活动,从就业状况、在城市的生活融入情况、与亲人朋友的关系、公民权利实现等方面全方位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尊严感。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278份,调查地点分布在全国东中西部,还纳入了在三线城市和一些小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覆盖的农民工户籍包括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的首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提前,工作趋于稳定;半数通过老乡朋友介绍求职;七成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劳动强度大;工作满意度一般,工资待遇和发展前景不明是拉低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本次调查中,受访者对影响尊严感的因素做了排序。他们认为影响尊严感的首要因素是工作情况(39.8%),职业发展仍然是他们最具梦想和期待的。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依次是公民权利的实现、在城市中的生活、融入情况,与亲人、朋友的关系。

结合调查样本平均年龄26.8岁,可以推断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在20岁左右,这与传统农民工初次务工的平均年龄26岁(全国总工会调查数据)有大幅度的提前。本次调查中16至20岁的受访者比例达到10.1%,这些重要的年龄特征意味着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普遍缺少农业劳动的经历。

受访者大多做过两至3份(平均2.8份)工作。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频率不太高,76%换过1至4次,整体就业状况比较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程度较低,与城里人地位差距的感受强烈。本次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进行了语义量表测试,发现他们在积极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陷入一种矛盾困扰。一方面,他们表示已经比较“习惯城里的生活”(3.66分),还表达了比较强烈的城市融入的热望,“愿意参加社区活动”(3.56分),“希望能在城里生活”(3.67分)。但是同时,他们不太认同“我跟城里人地位一样高”(2.98分)。

这实际上是新生代农民工边缘性的体现,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他们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的居住情况也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惑,与亲人朋友相隔两地,造成的心理失衡、情感孤独非常严重。本次调查中,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进城务工后独自一人居住,或与工友居住。与配偶和孩子居住的比例只有23.9%和12.0%。其中的情感缺失及深层次问题非常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照顾。

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认可城市的治安环境和医疗、教育、社会活动的参与、政府就业扶助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满意度偏低。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享受与城里人均等的公共服务,感受比较正面,总平均分达到3.3分。具体的,他们最认可城市的治安环境和医疗,对“治安环境好”和“看病方便”的打分分别达到3.5分和3.4分。

但是孩子的教育、社会活动的参与和政府就业信息提供、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认可程度一般。如何制定可行的政策,帮助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扶助就业,给予更多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需要更好的研究。

此外,在回答“其他影响你尊严感的因素”时,部分被调查者进行了自主填写,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五类:收入与购买力、社会公正、陌生社会中的排斥与歧视、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教育不公平等。

城市融入和公民权利实现超过与亲人、朋友的关系,成为尊严感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引起特别重视。这首先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从“改善生活”向“追求梦想”的转变,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谋求更好发展,希望未来在城市拥有稳定的家庭,让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权利意识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不仅在劳动权益的维护方面有较高的诉求,还希望获得更多的途径和机会参与社会活动。他们对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相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且认为这些权利的实现与尊严感的获得密切相关。

除了“面包”,还要“面子”

来自河南农村的吴小玲此前在一家小服装厂做普工,流水线式的工作状态让她厌烦不已,“丝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每天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将来也不会有发展。”吴小玲说她希望进入一家大型企业,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能有升级的空间。年前她辞了原有的工作,然后每天在各种招聘会上寻找机会。“工作不难找,难的是符合要求的。”

吴小玲的心态颇具典型性,对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要的不是“面包”。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浩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深的体会,在他眼里,这些孩子们拥有比前辈更高的文化、更多的梦想,他们对管理严苛、生活枯燥的工厂生活越来越难以适应,他们维权意识强,要求成长空间,希望快乐工作,以能否

使其成才来衡量工作岗位。

期望值增高的吴小玲们,在今年春天让南方的老板们尝到了苦头。据此前广州媒体报道,广州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等三大行业,缺口最为严重,缺口量预计达15万。而今年以来,不仅是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安徽、河南、湖北这样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农民工紧缺现象。

农民工真的减少了吗?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



资料图片

从监测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的数量没有减少,还略有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也逐渐成为求职者的主力。数据显示,他们在广东农民工数量的比重上已经达到了全省总量的75%。而他们对于前途的期望加重了“荒”的形势。很多企业发现,原有的企业计件薪酬和超时轮班工作对他们已经很难产生吸引力了。广东惠州市长李汝求在参加人代会前,刚访问过一个毛毯厂,那里缺高级拼花工人,但工资开到4500元,还是没有招到人。

在今天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李兴浩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农民工人力资源评级机制的议案。李兴浩指出,从企业层面讲,应当建立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变对外来工只会“吃苦耐劳”的传统印象,对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诉求的新变化,给予切实回应。

解决户籍不如先给保障

“以前人家就叫我小康,现在已经被称呼为老康了。”康厚明笑着说。

从小康到老康的时间并不短,在重庆这座城市里,康厚明已经打拼了28年。不过,让康厚明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被这座城市承认了。在2008年,康厚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全国仅有的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

康厚明一家现在仍蜗居在单位一间20平方米的简易宿舍里,屋里除了由两张单人床拼成的大床外,就是写字台和电视柜,但是康还是比较知足。

“在城市买房很难,城市职工缺房子可以去

申请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可是农民工没有这个条件。”康厚明说。

虽然顶着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但对他来说,自己首先还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这么多年来,本在城里买套房是这个男人最大的梦想。当听说重庆在今年就开始建公租房后,康厚明一家终于看到了买房的希望。

“其实工资、住房和社会保障这三块是农民工在城里安居的基础。很多人在强调户籍,这不是不重要,可是对于我们农民工来说,户口并

上。”王箫对此十分郁闷。

王箫郁闷的同时,另一些农村的青年正赶往中国的各个城市,开始他们的城市生活。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比起父辈来他们受教育的程度相对高一些,但如果没有技能,在现实的环境里同样面对很多求职难题。在重庆大学校长助理夏之宁看来,当下的用工荒一方面是用人单位待遇太低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农民工自身无法去适应节奏,缺乏产业升级后对于职位带来的新要求。

“农民工也需要再教育,去满足产业升级带来的新要求。”在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委孔令人也如此解读用工荒问题,“很多人认为洗脚畝田就能当工人,这个在以前劳动密集型的时候,不得已为之。到了现在,如果还不能转变,那么我们一定被困在产业链最低端出不来。”

技能就是本钱,没有本钱的普通务工者,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没有话语权。

王箫在四处碰壁后,终于发现自己必须再去学点什么。职业培训和再教育成为王箫当前最为迫切的需求。

同时,政府部门也发现了危机所在。“技术人才对于东莞来说尤为重要和迫切。”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毓全直言不讳地说。

最缺乏的地方,产生最现实的需要,东莞针对农民工的培训从2006年就开始了。东莞每年都会拿出10亿元用来实施“创业东莞”工程,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李毓全认为,这种模式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企业来说,政府财政资助减轻了企业培训负担,培养技术骨干和加强培训促进了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提高,也增强了技术更新改造的积极性;而对于农民工自身来说,提高了自身素质,也更加融入整个城市的文明,此外,也让他们在求职市场上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 and 吸引力。

在今天的两会上,广东东莞培训农民工模式获得了高度肯定。

王箫和吴小玲都试图摆脱自己只是一个“普工”的身份,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升级换代”,但他们拒绝再重复以前的工作,这种变化倒逼着企业、城市开始新的转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阐释“民工荒”问题时说:中国出现的“民工荒”问题有三大好处,第一方面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工人工资性收入,养老保险等会带来积极影响;第二方面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等有关问题的解决;第三方面有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有利于推进转型升级和缩小差距。很多人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想要真正融入城市并不容易

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们忙碌的身影,却忽视了他们内心的困扰。在新生代农民工心中,有着难以言说的纷扰,这其中有着和父辈彼此不理解造成的冲突,有着期望爱情寄托却往往不着边际的困惑,也有因为身份差别,内心隐藏着憋屈。这些有形或无形的隔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道路并不平坦。

据《半月谈》

新闻时评

地铁事故警示公共设施管理

近日,北京地铁4号线电梯因固定零件损坏发生逆行,造成1人死亡30人受伤。或许就发生在我们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或许就发生在我们熟悉的亲朋好友身上,似乎触手可及的悲剧,似乎擦肩而过的危险,让很多人惊出一身冷汗。

前段时间网络热传的“地铁表情图”,是北京地下轨道交通繁忙拥挤的写照。仅仅今年一季度,北京地铁的运营人次就达4.1亿。而同时,北京共有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1.4万台,在这个有196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自动扶梯可以说是日常用品。这些,都提示着地铁运营企业、市政交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地铁也好,电梯也好,这些公共设施的安全,关乎市民的安全,是城市中一件天大的事。

公共设施作为公共服务,更应保障公众安全。管理部门和相关机构,不应要承担起营运的责任,更应承担起社会安全、维护公民权利的责任。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这是行政责任的必然延伸;对于运营企业而言,这是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

当前,由于城市交通所需,也由于拉动GDP、制造政绩所需,各地地铁项目不断上马。工期紧、投资紧、分包机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隧道中心主任王梦恕,曾对地铁建设的安全隐患忧心忡忡。北京地铁电梯事故与工期、投资、分包等有关,还有待调查。不过,这已经提醒我们,在“地铁大跃进”时代,安全应该永远放在第一位。

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可能不止于于地铁、电梯。犹记得深圳华侨城“太空迷航”故障造成的惨剧;犹记得北京大雨后,掀起并盖的水下并吞两个青年。面对城市中的各种公共设施,如果管理机构和相关单位没有认真负责的态度、没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自警,每样都可能成为市民生活中的定时炸弹。

地铁等公用事业的市场化,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要促使逐利的企业做好公共管理、保障公共安全,政府责无旁贷。

对于北京地铁电梯事故,查找原因、追究责任、排查漏洞,是当务之急。城市的运转,更重要的是上下协力,推动城市公共设施、公用事业的管理。如此,才能真正建好世界都市。

张铁



现在,有车一族常在一起谈论,谁要说开车没被电子眼拍到,简直就是件稀奇事。有很多车当需要年检或买实时,才查到有不少“电子眼”,很多车主事先竟不知。为什么有些车被电子眼拍到的概率如此之高呢?有没有办法不被电子眼拍到呢?回答是肯定的,有!

想要不被电子眼拍到,首先要了解电子监控的种类功能及设置。目前郑州市区有四种监控设备,一是路口闯红灯,很好理解,从字面上就能明白,故不赘述。二是闯红灯。市区有些路段只能进不能出,还有些只能出不能进,为此,交警部门在这些禁行线路的进出口,均设有交通禁行标志,如果你违反这一通行规则,或是漫不经心,那你就被拍到。三是碾轧道路双黄线。双黄线有公路墙之称,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占轧,所以你就必须养成习惯,所有双黄线都别轧,不但电子眼拍不到,你行车也安全。四是路口三百六十度监控拍摄系统。这是个新生事物,兴的时间还不长但威力很大,以前驾车者总认为到路口我不闯红灯你就拍不到我,现在项目增加了,在路口四个方向的200米左右范围内,如果你违法变道、掉头或是乱停乱放,你就会被拍到,与电子眼拍到的闯红灯

如何面对“电子眼”

处罚的额度一样。

说说公车,如是单位公务用车,一定要建立详细的出车记录,谁替班了,谁临时借用了,借用的时间段,甚至是行走路线,都应该有详细的出车记录,这样就可以分清很多临时使用车辆的人有意无意“挣”来的电子眼。曾经有一个部门,半个月内有9个人开过一辆车,共被电子眼拍到16次,因该部门有详细的车辆使用台账,所以16个电子眼各有其主。

驾车通过有电子监控设备的路口时,不要尾随前车太近,尤其是大车,更不要在红绿灯转换的瞬间或“黄闪”时抢行,因为车流的快慢走停是不依你个人的意志决定的,你的一厢情愿可以通过,但往往事与愿违,这样你就很容易“卡”在那,监控对你就不客气了。

驾车行进中既要看天上挂的,还要注意地上画的,要明白各种交通标志标线的作用。面对电子眼不要耍小聪明,不要自以为是的,例如有的车到了路口,为了抢信号但又怕抢不过去,就来个大角度绕行,侵入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以此来躲避电子眼,这样或许会躲过电子眼,但接着路口三百六十度监控设备

切断资金外逃路

据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谈打击跨国腐败时说:当前,大量腐败所得被犯罪分子通过洗钱的手段从本国转移到别国。要从根本上切断跨国腐败资金外逃渠道,使每一个腐败分子无处可逃、无处藏身,必须不断提升打击和预防跨国腐败的实际效果。这一表态,为已经出逃或准备出逃的贪官们敲响了末日警钟。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坚定地反腐败,是得民心、顺民意的根本大计,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之一。

吴之如 文/画

还会将你拿下。

当发现自己的车出现莫名其妙的电子眼时,首先应考虑车辆是否外借,或是有无可能被套牌,然后根据这些电子眼出现的时间、地点、路段,回忆自己是否去过这些地方,如确定没有,可以到交警车管所查询,因为那里可以调出照片,真假李逵瞬间现形,交警部门也会依照程序予以纠正。在此也正告惯于套用、污损、遮挡和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者,要好自为之,不要违法。

有些车主担心行走一些破路、挖沟或是临时断行的路口、路段需要绕行时,会造成违章行驶,尤其是遇到交通事故现场,还有就是本不该走,但交警摆手非叫走,这些时候如被电子眼拍到怎么办,请放心,电子监控系统抓到车辆违法行为后,都要经过几道工序的甄别和筛选,像暴雨淹没了路面,大雪覆盖了地面标线,还有上述情况,监控系统均会在初检和复检过程中剔除。

综上所述,要想不被电子眼拍到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一句话,任何时候都要按章行驶,不抢道、不乱行,但更要服从交警的指挥,更要服从交通标志标线的提示和引导,就这么一条,只要做得到,你的车辆微机档案内将会是干净的。

彭天增

“违法者先富”挑战社会公平

7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分组审议情况,不少委员将矛头直指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有委员表示:“我们有食品安全法,还有一批法规与规章,包括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等,为什么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还是执法不严,执法主体形同虚设,法律法规没有落到实处,结果是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

“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这话说得可能有些严重,但却振聋发聩。因为现实中“违法者先富”的例子并不鲜见。违法者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却往往能够富甲一方,原因何在,值得反思。

有违法成本低的因素。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对企业食品安全领域违法行为的罚款上限是“货值金额十倍以下罚款”或“十万元以下罚款”。司法实践中,一些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当事人也往往被从轻、缓刑。对大多数违法企业来说,几十万元的罚款几乎是隔靴搔痒。挣的钱远多于罚的钱,于是有些企业在交了罚款之后继续违法。

有监管不力的因素。客观上,是监管队伍和人员的缺乏;主观上,是多头治理、各管一段机制下的可管可不管甚至干脆不管。

有利益驱动的因素。直接的利益是,一些监管者在拿了商家、企业的“孝敬”之后,便开始为其鞍前马后。间接的利益是,一些违法违规的企业是地方经

济的支撑,若当真依法严肃处理它们,地方经济发展的数字和成绩恐怕就没那么好看了。

还有一些制度设计上本身不合理的因素。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对人员、资产、规模都较小的企业即小作坊设立了较高的准入门槛,检测一次豆腐质含量,就要花上两三千,这样的成本小作坊怎么支付得起?于是索性做了黑作坊。类似的制度设计非但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反而将应该被监管的对象挡在了门外。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违法者先富”成为一种可能,甚至是“越违法越易富”。这不仅挑战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挑战了法律的权威,而且挑战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或许有人会说,即便这些企业先富、暴富了,获得的也是短期利益,终究会有被发现、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时候。“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人们当然可以相信这一点,可问题是,这个周期究竟有多长?可能的企业违规生产几天就被查处了,但也可能事人也往往被从轻、缓刑。对大多数违法企业来说,几十万元的罚款几乎是隔靴搔痒。挣的钱远多于罚的钱,于是有些企业在交了罚款之后继续违法。

有监管不力的因素。客观上,是监管队伍和人员的缺乏;主观上,是多头治理、各管一段机制下的可管可不管甚至干脆不管。

有利益驱动的因素。直接的利益是,一些监管者在拿了商家、企业的“孝敬”之后,便开始为其鞍前马后。间接的利益是,一些违法违规的企业是地方经济

琳